



真理树

钟永玖
◎ 著

作家出版社



真醒书

钟永玖◎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真理树 / 钟永玖 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63-6568-0

I. 真… II. 钟… III. 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07.4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67997号

真理树

作者: 钟永玖

责任编辑: 杨林

封面设计: 岑晓欧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026

印刷: 新时代印制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00千字

印张: 8

版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6568-0

定价: 2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吃水不忘挖井人，心中想念毛主席。新中国的独立自强来之不易，毛泽东承载着太厚重的文化。因此，寻共和国之根，抒毛泽东之情，成为作者散文创作的重大主题。真挚的情感，独特的思维，朴实的文字，不仅将读者带到真理树下去反思长征的革命历史，而且引领读者到中国诗乡去欣赏旖旎的山情水意，到丹砂古县去领略仡佬村寨的民族风情，到滇喉要道去感受奇绝的屯堡文化，到古夜郎去阅读改土归流的人间冷暖，同时，也可以窥见到刚刚过去的抗冰凌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的一斑，从而让人徜徉于崇高的思想境界之中，去找回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目 录

苟坝，真理之树长青	(1)
毛主席大像	(20)
圣诞节	(27)
众望所归	(34)
饮水思源	(38)
大坡的思念	(41)
海龙坝纪行	(43)
吟哦双门峡	(57)
赤霞寺怀古	(61)
金字三坝好风流	(64)
天坑与穿洞	(67)
五汇水库掠影	(70)
九道水之恋	(73)
文化务川	(76)
客气·人气·大气	(79)
务川的八景文化	(82)
丹砂文化，五彩斑斓	(86)
走马仡佬民族文化村	(90)
去看婺星石	(93)





耳闻目睹藏凤岩	(96)
站在栗园	(99)
感受屯堡文化	(101)
登天台山，游伍龙寺	(106)
泛舟邢江河	(110)
仰望陈定斋	(114)
历史的见证	(118)
写作与人文精神	(121)
蹇先艾：贵州现当代文学之光	(131)
走进那个时代，走进那个世界	(142)
我是一棵知音草	(156)
人生是一本难写的书	(159)
想起两个小故事	(164)
没有故事的攻坚战	(167)
采自抗灾第一线的小故事	(170)
心中的乐园	(174)
教书育人，硕果累累	(177)
在黔北教育的高地上立正	(184)
名城中医有新秀	(189)

附录

民间叙事中的文化守望	胡长斌 (191)
读钟永玖	袁仁琮 (196)
敞开胸襟，真情永久	熊维良 (199)
谈点钟永玖文学创作的个性及风格	沈嘉泽 (202)
植根于山水间的文字	张小江 (204)

红色经典的忠实捍卫者	黄俊杰 (207)
教育题材散文的新开拓	王黔辉 (213)
我看钟永玖先生的小说	喻莉娟 (216)
只管攀登不问高	常 江 (218)
散文的基本结构	李独醉 (220)
行文流畅,意切情深	游来林 (222)
“三心二意”话永玖	胡高荣 (224)
钟永玖作品的文化价值	杜 扬 (226)
韵的回味,情的闪光	润清云 (227)
性情中人,性情写作	常 言 (228)
十年出版著作十二部,钟永玖作品引起关注	王晓瑞 (233)
贵州省写作学会召开钟永玖先生的作品研讨会	黄亚文 (234)
情的闪光,韵的回味	润清云 (235)
钟永玖作品研讨会在筑举行	李晓鸿 (236)
钟永玖作品讨论会参会人员名单	(237)
后记	(239)

苟坝，真理之树长青

万里长征，震撼世界，古城遵义，名闻天下。

但是，朋友，你知道苟坝吗？你知道苟坝的“新房子”吗？告诉你吧，在长征途中，继“遵义会议”之后，曾经举行过又一重要会议的苟坝，至今仍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苟坝会议会址所在的“新房子”，更是一个历经 300 年沧桑而早已破败不堪的四合院。在史学家看来，红军长征的史诗中，苟坝，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更富传奇的色彩；新房子，这座土里土气的四合院，更有耐人寻味的故事。那么，马鬃岭下那一株真理树，特立挺拔，百年长青，是不是也要将这段历史向后来者一直讲下去呢？



故事，从遵义会议说起

世人都知道，遵义会议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这是不错的。但是，与苟坝会议比较起来，却是一次相对从容的会议。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经过了几个月充分准备才召开的。难道不是吗？长征，就实质上，是第五次反“围剿”大失败后的大逃跑！自头一年 10 月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以来，中经几个月的时间，错误路线的推行者仍在不断地重复着过去的错误，而毛泽东呢，则以对革命高度的责任感，一直在耐心地做着说服的工作，又极力地纠正着那些明显的错误。大溃逃的长征大队伍，在跌跌撞撞中，通过敌人一

道道的封锁线，同时，又在烽烟滚滚中汲取着血淋淋的教训。因此，许多同志都不仅逐步认识到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的诸多军事失败是怎样造成的，而且对李德、博古的瞎指挥愤愤不平，怨声载道。有幸的是，毛泽东的口舌没有白费，湘江战役所剩下的红军种子，没有最后送进蒋介石在湘西设下的布口袋，而终于转向了这地瘠民贫而又相对安全的西南边陲。接下来，无论是通道会议，黎平会议，还是猴场会议的召开，都为遵义会议作了极好的铺垫。到了遵义，中央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李德、博古、凯丰等顽固的错误坚持者，其余的同志都已经基本上站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了。尤其周恩来、朱德等重要人物可说是最早鼎力支持毛泽东的，而张闻天、王稼祥，虽然是逐步转过弯子来的，但最后却是坚定地紧密配合的。当然，在遵义会议上唇枪舌战，也免不了硝烟弥漫，有人称为无声的战场，但一起力挽狂澜的，毕竟不只是毛泽东孤身一人的力量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难道不似“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事了？

彪炳史册的遵义会议，着重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下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以及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了第五次“围剿”未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会议最后做出的决定，除了改变原定的红军行动方向，还确定了新的人事安排，那就是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

在遵义会议上，王稼祥在发言中就提出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毛泽东说：军中之事，还是让恩来拍板！遵义会议后，周恩来提议让毛泽东接替博古的工作。毛泽东说，如果让我出来，

还有很多人不服，我想还是让洛甫出来，这样，两边都可以过。毛泽东心知肚明，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不仅提出了张闻天作为适当的人选，而且说出了充足的理由。他说这个话，因为合乎当时实情，又能以理服人，不仅完全是真诚的，且是深思熟虑的。王稼祥、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提议也是真诚的，且是充满了新的希望的。周恩来还不只一次地给毛泽东做工作，希望他能担起全党的重担，但毛泽东则总是力荐张闻天。二月五日，到“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交权，周恩来再次提议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又说：还是让洛甫做一段好。就这样，张闻天接替了博古，做了八年的总负责人。

对此事，张闻天和毛泽东在后来都作过表白。张闻天说：“在遵义会议上，我不但未受打击，而且我批评了李德、博古。我不但未受处罚，而且还被抬出来代替了博古的工作。”毛泽东则说：八年总书记的张闻天是位“开明君主”。这是很值得玩味的。

许多事实都证明，毛泽东力主召开遵义会议，并非是他个人想争夺红军的指挥权，更非是想争夺党的最高领导权。平心而论，面对当时红军的重大损失，面对革命的何去何从，真不知有多少人茫然不知所措！只有毛泽东清醒地知道，牵牛要牵牛鼻子。因此，他以对革命的忠诚，抓住当务之急，既要解决问题，又要团结同志，着力批评“左”的军事路线，取消博古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他这么做，也确实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自遵义会议以来，张闻天对毛泽东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做了不到一个月的总负责人之后，面对当时瞬息万变的形势，他提出成立前敌司令部，实质就是要让毛泽东出来参与当前作战的军事指挥。三月四日，中央纵队进驻遵义，中央军委即根据张闻天的提议，成立前敌司令部，果然是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这一正确的举措，与其说无异于让毛泽东在实际上恢复了宁都会议后失去的兵权，毋宁说，红军重新选择了毛泽东，又

回复到当年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朱毛不可分”的组合状态。

毛泽东不负党中央的厚望，根据斗争实际情况，按照他那长期锤炼的军事思想，及时做出正确的决议。但是，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委只当了六天，即在苟坝被彭德怀所取代。笔者查阅了《遵义文史资料》所载中央红军在黔北军事活动日志，对这六天的情况大致是这样记载的：

一九三五年三月五日，二十三时三十分，朱德、毛泽东在遵义以前敌司令部的名义签署了作战命令，决定消灭中央军周浑元部肖致平、谢溥福两师，以开展新的局面。后因周浑元退却，不敢与我决战，此命令未能实现。同日，又以前敌司令员朱德的名义下达《关于各军团集中鸭溪和作战部署》的电文，决定九军团诱使北面追敌东向，让野战军集中主力西进。其部署是：第三军团上午停鸭溪待令，以下各军团由现地取道忠庄铺，由马坎向鸭溪运动；前敌司令部六时半由遵义老城出发；第一军团七时由遵义新城北门出发；干部团十一时由高桥出发；第五军团十时由董公寺出发。

这一天，前敌司令部到了鸭溪。红军攻克了遵义县鸭溪，并以遵义至鸭溪地域为后方，主力则在遵义县的鸭溪、枫香、泮水、白腊坎，以及仁怀的长干山、鲁班场一带寻机歼敌。

三月六日，中央纵队进驻金刀坑。红一、三、五军团和干部团离鸭溪西进，驻仁怀大王寨、井坝等地。

三月七日，中央纵队仍驻金刀坑。由于敌判断我军有西进意图或先与周纵队决战后再向西南压迫贵阳的意图，敌周纵队决定在长干山附近构筑工事暂取守势，然后配合吴纵队夹击我军。如我西进，周纵队即向黔西北地区“兜剿”。吴纵队仍在乌江南岸，配合周纵队对付我军。敌已扼守乌江各渡口。据此敌情，军委决定我主力在鸭溪、白腊坎一带以待机姿态休息补充，并开展发动群众工作，赤化所在地。

三月八日，中央纵队驻鸭溪地域。这天，《党中央为粉碎敌

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敌人新围攻正摆在我们面前，全党同志用一切努力来粉碎敌人的新围攻，来建立苏区根据地，是目前每个共产党员最中心最神圣的任务。”我军主力仍在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待机。一部由鸭溪向遵义东进，红军第三次进入遵义城。

三月九日，中央纵队驻花苗田之苟坝附近。二时与三时，军委两次电令“九军团迷惑钳制桐梓方向的敌人，主力则于今九日尾击并消灭周敌”。于是，红军大部进入仁怀长干山地区。一军团驻长干山地街上，五军团驻滥泥沟，三军团驻倒流水。

三月十日，中央纵队驻苟坝地区。军委决定袭击太平场、西安寨地域的王家烈部队犹禹九旅，开拓作战地区，并威胁周浑元部，以引动周纵队求得决战。后因敌退泮水，我攻击未成。一时，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致电军委，建议我“野战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新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

苟坝会议，一惊一喜两大事

林聂电报的核心，是主张打黔军驻守的打鼓新场，即现在的金沙县城。过去，打鼓新场是黔北的商业重镇，故有“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之谚。现在，却想不到一纸电文引动政治局召开了三天重要的紧急会议，这就是苟坝会议。

林聂要打金沙，自有其充足的理由。他们认为，自遵义大捷后，红军士气高涨，求战心切，而从下一步红军的走向来看，打金沙也是必须的。

军委主席朱德收到这一万急的电报后，引起共鸣，遂将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等传看。周恩来、王稼祥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则皱紧了眉头。张闻天看过电报后，自认不懂军事，作为新任的总负责人，面对这样的军事大行动，他更不愿重复过去博古、李德独断专行的教训，即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会议在苟坝村召开，气氛很热烈，都认为：自遵

义会议以来，成天跑路，拖得大家精疲力尽，又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因此与会多数人都与林聂的看法无二，认为红军多次寻战未果，既然敌军已逐步围来，就应该攻击打鼓新场，歼灭那里的守敌。二十多人参加的会议，大家均无异议。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打鼓新场的守敌，虽然只有一个师，但易守难攻。打这样的阵地战，对红军不利。他严肃指出：我们不应该只看见打鼓新场的守敌，还应该看到打鼓新场外的周泽元、吴奇伟两个纵队和滇军孙渡纵队。因此，他坚决主张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要怕跑路，不要怕苦怕累，应随时给敌人造成错觉，进而调动敌军，在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凯丰听了毛泽东的陈述，不禁吼了起来：“典型的游击主义，逃跑主义！”王稼祥也从躺椅上撑起来发了言：“我们撤出遵义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如果不再打一仗，就会失去歼敌的有利时机，冷了将士们的心！”结果，毛泽东的意见始终未被大家接受，惟有周恩来未作表态，张闻天让大家举手表决，大家一致通过。这样，张闻天只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采纳林聂的建议。

军情火急。差之毫厘，将失之千里！毛泽东眼看红军又面临着一场灭顶之灾，他急得气愤地说：“你们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凯丰站起来责问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干什么？”张闻天一见毛泽东甩手不干了，也无可奈何地说：“你不干，就不干吧！”

毛泽东以为这会引起大家的重视，哪知张闻天竟顺水推舟。毛泽东一气之下就走了。他以为这一走，大家就会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哪知，又有人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于是，更乘机起哄。通过表决，不仅采纳了林聂的建议，让周恩来拟定电报，还撤消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

撤消这个职务，毛泽东并不在乎。因为他已不止一次地受到

过“撤职”、“开除”的处分。关键是又重复过去的“左”倾错误，总是一次次地使红军受到不应有的损失。现在，剩下的这几万红军，一旦钻进敌人设置的口袋，就只有全军覆没！这比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比湘江战役更惨！如果是那样，遵义会议也等于白开！遵义会议虽然批判了李德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取消了“三人团”，但“左”倾错误的影响还根深蒂固！毛泽东回到住处，想了很多，他一根接一根抽烟，烟头甩了一地，直到深夜，还是难以入眠：这是中国革命惟一的种子，再也经受不起损失了……于是，翻身起来，提着马灯，就沿着崎岖的山路，忙向三里外的周恩来住处走去，力图劝阻周恩来暂缓发布作战命令。毛泽东来到“长五间”，推开门开口就问：“恩来，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发了吗？”周恩来迎了出来，急急地说：“泽东同志，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哩。刚才一局送来情报，黔军犹旅由西安寨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急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再有，川军和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

毛泽东激动地说：“果然不出所料，打鼓新场是个陷阱！”正说着，孔参谋急急推开房门报告：“周副主席，二局送来一份急电。”周恩来接过一看，电文说，红军如欲进攻新场，周敌与川敌有向野战军侧背夹击之势……周恩来终于被说服了。他说：“我就是没有看准，才不敢下最后决心啊！还是你的考虑是对的！”接着，他俩又提着马灯向朱德住处走去，并表示同意第二天一早赶快再开会继续讨论。三月十一日的会议，终于说服了全部与会人员，取消了向打鼓新场进攻的计划。军委主席朱德以充分的理由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电文指出：“据昨前两天情报，犹（禹九）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十二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十二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

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十一号二十一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时行动。”

危局被扭转，毛泽东才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但是，前敌司令部政委的重新恢复，却并没解除毛泽东心中的隐忧。他又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战争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如果老是这么多人讨论来讨论去，必然会贻误战机。于是，他说：“既然如此，就不能再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搞少数服从多数。”他提出组织新的三人小组，集中指导。有人质疑说：遵义会议刚取消了“三人团”，现在又来成立三人小组，这不是重复过去的错误吗？毛泽东说：“我们批评李德、博古那个‘三人团’所执行的军事路线，不是说这种组织形式错了，‘三人团’这种组织形式还是需要的。”张闻天自认不懂军事，再加这次主持军事紧急会议的争论，使他更认识到毛泽东意见的正确，于是就提议：“新的三人团应该由泽东、恩来、总司令三个同志具体负责！”总司令推说自己的头衔太多，陈云提出：“如果总司令不在这个小组里，除泽东与恩来外，是否就请稼祥同志参与。”毛泽东却风趣地说：“军中之事，我在前天不是已经挂出免战牌了吗？今天，大家又把我抬出来，恐难负重任，有辱使命！”朱德说：“前天的争论，润之讲的有道理，现在不是已经收回攻打打鼓新场的指令了吗？”就这样，新的三人团宣告成立。周恩来提议：新的三人团由毛泽东同志负责。毛泽东却说：“恩来，你不必谦虚，遵义会议上不是明确军事问题最后由你拍板？当仁不让嘛！这一角，还是由你来扮演。”周恩来说：“根据需要，可以改变嘛！”毛泽东说：“还是不改为好，令行禁止，岂可朝令夕改！”就这样，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成为指挥红军作战的最高权力机构。洛甫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感叹说：“今天算决定了一件大事！”从此，三人团就保障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原则得以继续坚持和顺利贯彻执行。当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

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针，毛泽东针对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局势，作出了新的部署。于是，就有了三渡赤水和四渡赤水的实施，得以完成他那神来之笔的绝唱。

中国革命胜利后，每当遇到事情不顺心时，毛泽东就回忆起战争年代那些或“左”或右的坎坷，念念叨叨地说：“真理，有时候也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于他这句话的含义，许多人都非常明白，无论是陈独秀对他的责难，还是瞿秋白对他的处分，或者王明、博古对他的排挤、打击，都是很好的注脚。不过，那些事都是发生在错误路线统治的时期，那时的毛泽东也还比较年轻，共产党也还比较年轻。值得深思的是，在标志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遵义会议之后不久，刚刚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取消了博古、李德的瞎指挥，却又产生了一场关于打鼓新场的激烈争论。面对着生死攸关的紧急军情，二十多个高级人员一起开会，惟有毛泽东持不同意见，尽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支持他的看法，还有人乘机起哄！试想：如果不是毛泽东以对革命认真负责的精神品质，冷静对待，又不辞辛苦，连夜提着马灯行走三里多山路去说服周恩来，而周恩来又如果不及时收到一局和二局送来的情报，遵义会议也就真的白开了。然而，坏事变好事。打不打打鼓新场的争论虽然惊险，毕竟最终还是辩明了真理，大家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毛泽东进入新三人团，真正能发挥他的军事才能，这就是苟坝会议的巨大成果。由此，我们就可以掂量掂量：苟坝会议的分量究竟有多重！

走，到苟坝看看去

苟坝是一个值得去看一看的地方。那么，苟坝在哪儿呢？

黔北高原的盛夏，阳光灿烂。八十周年建军节的纪念活动还在隆重开展。“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们踏着这歌声的节拍，向苟坝走去。

公历8月6号这天，是农历六月二十四日。我们几个文化人

从遵义城驱车 55 公里，来到遵义县所辖的枫香镇，时已至午。因为枫香四、九赶集，所以正逢场期，几条大街都人挤人，货成堆，生意正兴隆。按照事先的约定，热情的副镇长李自强正在办公室等候。吃过午饭，李镇长陪我们一道前往。

汽车在蜿蜒的山村公路上颠簸。李镇长在介绍情况中，颇有歉意地说：“过去，这是一条运煤的公路，现在重新修整，还没有完工……”

但我却在沉思中追寻当年红军的身影，想象那如夜空中闪亮的群星，怎样洒遍了黑暗的黔北高原。其实，那更似一丛丛燃烧的火把，不仅要照亮前行的夜路，更要在这里播下革命的火种，让其燃烧成燎原之势，焚毁那腐败的世界！于是，很快，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尚稽区、鸭溪区、刀靶水等各区镇的临时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懒板凳、团溪、青坑等革命委员会成立了，还有各区、镇、乡土地革命委员会、抗捐委员会也纷纷成立了。与此同时，各级群众武装的游击队成立了，各级群众组织的工会、农会、儿童团也成立了。他们宣传革命，宣传抗日，反对剥削、反抗压迫、抗捐抗税，真是如火如荼！遥想那时，这高原的山乡，连汽车的影儿都没见过，哪会有公路啊！但乡间的羊肠小路是有的，乡民们赶苟（狗）坝场，赶花苗（猫）田，赶枫香坝的赶场大路是有的。

如今，这条运煤的公路已经重新整修。但看着那仅仅铺上了一层碎石，却没有铺细沙，没有铺水泥的路面，开车的师傅小马感慨说：“这么难走的路，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在苟坝开过会，你们这些作家是不会到这些地方来的。”

我说：“路途难走，就是不方便，的确不容易来。我们已经起了好久的念头，就是特意想去看看那个举足轻重的苟坝会议是在哪儿开的。要不是毛主席在那儿开过会，我们肯定很难到这些地方来！不过，这不能说是因为怕苦怕累……”

不等我说完，胡长斌接着道：“红军之路，就是一条难走的